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第一辑

梁启超与
晚清文学革命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407-0684-8/G·100

定价：3.80元

近代文学研究丛书

第一辑

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

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

连 燕 堂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16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300册

ISBN 7—5407—0684—8/G·100

定价：3.80元

近代文学研究丛书

第一辑

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

目 录

提要	(1)
结论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与文学活动，兼论晚清文学革命运动	(4)
一、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辟之——梁启超文学革命论之破坏论	(7)
二、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梁启超文学革命论之建设论	(17)
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对晚清文学革命的作用及影响	(29)
四、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关于晚清文学革命运动	(52)
第一章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和新文体	(66)
一、梁启超之前的清代散文和梁启超的	

批判继承	(66)
二、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	(79)
三、梁启超散文创作的历史分期	(92)
四、新文体的形式和艺术特色	(123)
第二章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和诗歌创作	
	(145)
一、晚清诗坛之概况	(145)
二、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发起者之一	(149)
三、梁启超是“诗界革命”最重要的理论家	(156)
四、梁启超的诗歌创作	(175)
第三章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与其实验品	
	(203)
一、梁启超早期的小说理论	(204)
二、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	(217)
三、《新中国未来记》及其“副产品”《新小说》杂志	(241)
四、关于《告小说家》	(258)
第四章 梁启超的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	(263)
一、传统曲论与清代剧坛	(263)
二、梁启超的戏剧理论	(268)
三、梁启超的传奇创作	(280)
四、关于广东戏本《班定远平西域》	(296)

提 要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光绪己丑(1889年)举人。旋入康有为门下。维新运动期间，追随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创办《中外纪闻》，主持上海《时务报》笔政及湖南时务学堂讲席，著《变法通议》等，宣传维新变法，声誉鹊起，时人合称“康梁”。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发表《新民说》、《饮冰室自由书》等著作及《少年中国说》等著名散文，批判传统思想，揭发社会积弊，宣传新学思潮，鼓吹“政治革命”，甚有影响，被称为“舆论界之骄子”。1905年后虽公然反对“排满共和”，但在揭露清廷失政和传播西方学术思想方面仍有积

极的贡献。辛亥革命后曾在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分别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企图引袁等走上宪政轨道，不合与国民党为政敌，反被袁等所利用；但又在反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后脱离政界，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涉猎甚广，于文史两科，尤著实绩，且造就人才甚众。

梁启超是晚清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和鼓吹者，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戏曲改良”甚力，对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多方面积极的影响。在创作上，他于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翻译等领域都起过带头作用，尤以散文的成就和影响最大，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且“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他的诗与散文有同调，热情奔放，汪洋恣肆，明白晓畅，表现出一种勇往直前、追求理想的进取精神；一些作品还在形式上表现出摆脱旧格律的束缚、追求诗体解放的趋向。晚年诗风流入宋诗派，丧失了进步意义。

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但对近代小说发展有特殊的贡献。他不仅率先喊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而且提出了广译“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

于今日中国时局”之“政治小说”的规划，促进了小说翻译并影响于小说创作的发展；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见解，并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试图从艺术特性上探求小说生命力的根源，开启了中国小说理论的新纪元。加上他第一个动手翻译和刊登政治小说，第一个亲自创作政治小说，第一个创办以登载新小说为主的刊物，又第一个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所占有的开辟新时代的地位。

此外，在文学总体上，他主张广泛输入欧洲的思想意境，乃至形式语句，加以消化吸收，造出本国的新文学。这不仅加速了中国文学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而且启动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

本书试图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梁启超，探讨他的文学革命论、文学创作以及它们对近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绪论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 与文学活动，兼论晚 清文学革命运动

说到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如果限定用一个字来概括，那么我说是：“变”。具体一点说，就是由地主阶级的旧文学，变为资产阶级的新文学；由忠君爱国、反抗异族欺凌的汉民族文学，变为救国强种、反抗外国侵略的中华民族文学；由自我完善的封闭文学，变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文学；由只供少数人享用的言文分离的古文文学，变为面向群众的明易晓畅的新文体文学；由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变为以小说为主体的新时代文学。这些变化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成为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之间一个独具特色的过渡阶段。

当然这些变化不是同变戏法那样，说变就变，而是经过了几代人的痛苦抉择、艰难探索。追溯始源，变起于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他是近代第一

个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梁启超评说：“自珍性诙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椒诡连猝，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喜；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①可见他的作品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产生过多么重大的影响。

和龚自珍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还有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林昌彝、黄燮清、贝青乔等一班人，他们在作品中表达的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呼声，拉开了民族解放文学的序幕。

稍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人们的眼界日益开阔，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认识日益清晰，要求变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反映到文学上，有翻译事业的开展和早期文学翻译的产生；桐城派以提倡“经济”而中兴；一批旅外游记、日记的涌现；报章文体的初兴；“言文合一”论的提出；诗歌中新意境、新语句的出现等。

① 《清代学术概论》。

洋务运动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时期文学的主流是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文学，在许多方面为晚清资产阶级文学革命运动开启了先路。

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变化还只是整个近代文学变革的孕育和萌芽，文学的总体面貌，特别是人们的文学观念，还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变化。明显的、实质性的变化兴起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甲午之役，中国败北，举国人民，痛心疾首，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竞思疗救，海内缤纷，竟言新学，终于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戊戌维新运动。这场运动的鼓吹者和领导者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主张思想解放，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提高国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对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因而十分重视利用各种文学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但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旧文学总以卫道翼教为职志，从内容到形式，虽经上述两个时期的微弱变革，仍不能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一场文学革命便不可遏止地应运而生了。当时站在政治斗争前列的志士（包括稍后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著述，或翻译，无不使用文学这一武器，也无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着文学改革。其中的梁启超，由于思想比较激进，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比较全面，加上他博学广识的天赋和多思善变的性格，

便率先喊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包括戏剧)界革命”等口号，并且做了相应的理论阐释，正式地树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的新局面。他的创作活动也基本上实践着他的理论，起着榜样的作用。因此，他是晚清文学革命运动的鼓动者、组织者和实际上的领导者。

本章将综合概括地介绍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文学创作及其影响；兼论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究竟是不是一场革命，是否形成了一场革命运动？

归纳起来，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不外破坏和建设两端，亦即批判封建阶级的旧文学，开创资产阶级的新文学。

先述他的破坏论。

一 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 ——梁启超文学革命论之破坏论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避居日本，继续寻求救国道路。初期，他同孙中山等革命派领袖有着广泛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又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艺理论，使他的思想益加解放。他总结了维新运动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不除旧无以布新，不破坏未能建设的道理，认识到以往的维新变法，“枝枝节

节而行焉，步步趋趋而摹仿焉”，必不能使国家进于文明之境，立于不败之地，如不进行根本的改革，则好比“披绮罗于嫫姆，只增其丑，施金鞍于驽骀，只重其负，刻山龙于朽木，只驱其腐，筑高楼于松壤，只速其倾，未有能济者也”。因此便昌言“革命”，鼓吹“破坏”。在政治上，他大声疾呼：“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与相呼应，在学术上，他明确号召：“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①这是本世纪最初几年里梁启超基本的政治思想倾向，也是他文学革命论的基本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才使他的文学革命论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批判精神。

（一）他尖锐地批评无用的文学

早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他就指出：那些“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伤春惜别”的诗词，“不能目之为学”。戊戌以后，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

① 《新民说·论进步》。

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①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关世运的本就甚少，“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蠹矣”，于国民无丝毫之影响。^②于世运无关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他断言：中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③

他也批评当时风行的低级趣味、无所取义的报刊文章，认为皆“陈陈相接”，体例“无一足取”。“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甚乃如台湾之役，记刘永福之娘子军，团匪之变，演李秉衡之黄河水，明目张胆，自欺欺人；观其论说，非‘西学源出中国考’，则‘中国宜亟图富强论’也，辗转抄袭，读之惟恐卧。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④

梁启超认识到“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⑤从而以是否有益于社会做为品评文学的标

① 《夏威夷游记》。

② 《饮冰室诗话》。

③ 《夏威夷游记》。

④ 《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⑤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于当时有积极的意义。

（二）他又猛烈地抨击有害的文学。

他认为，中土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海盗海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佳制盖鲜”；^① 那些出于“华士坊贾”之手的庸劣小说，充斥着“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狐巫鬼之思想”，“毒遍社会，陷溺人群”，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如果“大雅君子”对小说“不屑道”，一任“华士坊贾”之操纵，则吾国前途将不堪设想。于是他大声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

梁启超认为腐败小说的影响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视新小说为改良社会的法宝，固然反映了他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他对旧小说的批判却基本上符合《水浒》、《红楼》以后中国小说界的实际，他从改造社会、教育国民的角度出发，呼吁人们重视旧小说对于社会人群的精神污染，也表现出他做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敏锐的嗅觉和眼光。他指出：人们对于小说，“夫既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相与呼吸之、

① 《译印政治小说序》。

②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